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1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社論：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

討論 (1)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問題..... 汝 信 (6)

試驗和推广.....李守璋 李学昆 (17)

“新边疆”和“全球战略”的真谛陈 原 (20)

“和平革命”的招牌和殖民主义的

实质.....鍾国豪 (24)

肯尼迪正在南越重蹈历史的复轍..... 陈有为 (29)

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

按比例的发展 許滌新 (32)

教学小品 敢 峰 (38)

漫画：“拓荒的勇士們，开步走！”.....江有生 (23)

☆ 六月一日出版 ☆



——社論——

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討論

在我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科学技术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建国十几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家建設中各种科学技术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的劳动和貢獻，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不仅有許多具体科学技术問題，需要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研究和解决，而且有許多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問題，也需要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試驗，参与討論和解决。这样的問題在各方面都有，例如，有关农田耕作制度的确定和改革，优良品种的选择，森林采伐和更新的方式，水利工程修建和利用的原则，重大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和推广，各种工业的原料材料选择和构成的方案，各种燃料和动力机械的构成比例，不同生产部門机械化、自动化的水平等等的問題，以至如何利用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的规划，在什么地方建立什么商品粮食和經濟作物的基地，在什么地方建立什么工业等等的問題。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的制定，关系到国家建設各个方面的重大部署和生产技术各个方面的发展方向。决策正确，建設工作就能进行得多、快、好、省；决策有缺点或錯誤，就会給建設工作造成損失。

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經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資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規律，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为了制定技术政策和重大的技术措施，一方面，有許多經濟問題需要研究，有关的政治因素也需要考虑；另一方面，有許多科学技术問題需要研究。一項技术政策和措施在科学技术上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是否合理，是这项技术政策和措施能否在經濟上达到多、快、好、省的根本前提。因此，国家建設工作的各个领导部門，应该十分重視組織有关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討論，把这种研究和討論当作决定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必要的基础工作之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苏联刚刚开始經濟建設的时候，列宁曾經組織了二百位科学技术专家参加制定全俄电气化的統一經濟計劃。在討論这个电气化計劃的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說：“我們是在非常重大的轉变关头在这里开会的，这个轉变無論如何都证



明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①

我们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方针、政策、措施，从来是主张走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当然也要采取这个方法。在科学技术问题上走群众路线，就是说：既要集中广大工农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也要集中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经验和智慧。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问题，既然对国家建设事业有重大的影响，就更加需要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倾听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较高造诣和较多经验的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这是我们国家建设工作中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科学技术人员来说，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规划和技术政策、技术措施问题的讨论和制定，在这些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研究成果，从科学上、技术上和经济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对于国家事业的政治热情、主人翁态度和责任感的表现。

在研究、讨论各项技术政策和措施的时候，会出现许多学术上不同的意见和技术上不同的方案，会发生许多争论。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对待这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呢？我们党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方针。这个方针要求我们在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问题的科学讨论中，必须容许和鼓励人们发表不同的科学技术见解，提出不同的技术路线、方案、方法和设计，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让不同的见解、方案、学派都有条件进行研究、试验，并且自由地进行争论，自由地相互比较。

认识自然规律，要经历曲折的道路。要在实际生产中很好地利用自然规律，又需要研究各种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制定技术政策和确定重大的技术措施时，还要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结合我国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这就必须考虑到许多极为复杂的情况和因素。在进行各项生产建设工作时，不但应该力求获得目前的、直接的有益效果，而且要考虑长远的、间接的良好后果，预防和克服各种消极的后果。一项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的采择，不但会影响到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利益，而且往往还影响到其他部门、其他地方的利益。充分认识这些目前和长远、直接和间接、局部和全局的后果，并正确地加以处理，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此，在研究各种科学技术问题时，在讨论各种技术政策和措施时，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出现关于技术路线、方案、方法、设计等等的各种不同主张，是十分自然的。

不同的科学技术见解可能是各有所见，各有所偏；经过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和批评，可以克服各种错误和片面的认识，达到比较一致、比较正确、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不同的技术

^①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6页。



路綫、方案、設計等，也可能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通過具體的分析和比較，權衡它們在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優劣利弊，可以擇優汰劣，選取一個比較合理和先進的路綫、方案和設計，或者取長補短，促成一個新的、更合理、更先進的路綫、方案和設計的出現。如果意見十分分歧，爭論相持不下，很難統一，那末我們就應該考慮，對這項技術政策和措施作出決定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或者在實行某些措施時採取更加慎重的步驟。因此，這種充分揭露矛盾，力陳利弊的討論，對於我們最後制定出正確的或者比較正確的技術政策和措施來說，對於我們在生產技術上進行正確的或者比較正確的領導和指揮來說，是極為有利和十分必要的事情。

自然科學和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關於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不同學術見解和技術見解的爭論，一般來說，都是屬於認識過程中的矛盾的表現，而不是階級利益衝突的表現。因此，在關於技術政策和措施的研究和討論中，對於不同的學術見解、技術方案等等，不應該貼上各種階級的、政治的標籤。當然，實行不同的技術政策、措施和方案，會影響到國家的建設事業，使它搞得更好一些、快一些，或者差一些、慢一些，甚至受到損失。但是，不能把科學技術方面的不同主張，把由於認識不足而提出的較差的甚至錯誤的主張，當作政治性質的錯誤來批評。而且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哪一種主張較差，並不是很容易地就能判定的；如果忽略了各種複雜的條件，只從某種片面的見解出發，就輕率地判定某一種主張是唯一正確的主張，而把其餘的主張看成是錯誤的，這種判斷當然是不可靠的。

在科學技術上，我們不但提倡敢想、敢說，而且提倡敢干。敢干，就是說，敢于去進行試驗。一切科學技術上的創舉，必須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試驗，有了可靠的根據，才能逐步推廣。一切未經試驗證明切实可行的技術措施，絕不應該推廣。在進行試驗時，如果條件允許，應該儘可能使不同的技術路綫、方案、方法和設計都能進行試驗研究，使它們有通過實踐獲得考驗和比較的機會。有一些試驗研究工作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得出結果，對於這些工作，我們應該看得遠一些，及早地作出安排。

在技術政策和措施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中，應該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國的經驗。當然，各個國家技術的發展，決定於每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和具體的社會條件與自然條件。社會主義制度，為按照科學技術的合理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造自然，發展生產，开辟了廣闊的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技術的發展則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束縛和影響。但是，應該看到，不僅是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就是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技術發展的經驗，也會有許多共同的东西，可資學習和借鑒。一種技術能否在一個國家、在一個企業被採用，而且取得經濟上的良好效果，總要取決於這種技術本身在經濟上的優越性，取決於自然資源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近年來，有許多技術，因為在經濟上的巨大優越性，以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在社會



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普遍的发展。合成纖維和塑料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在討論各种技术政策和措施时，应该广泛收集和研究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发展的情况；研究各个国家在发展技术、改造自然方面的历史經驗，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經驗。这些情况和經驗，在某种意义上說，都是为我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技术路綫、方案、方法和設計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比較，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們自己的生产和建設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結論。

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討論，与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实际工作，是有联系的，但是它們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情。对于学术討論，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需要、也不应该由行政上对爭論的問題作出結論；而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是实际工作問題，需要由有关的行政和技术领导机关在一定时期內經過慎重的选择，作出决定，按照某种学术見解，某个技术路綫、方案、方法和設計等来采取实际行动。

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措施时，必須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一）在制定技术政策和措施之前，要高度发揚民主，充分展开討論，仔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見。科学研究和学术討論越是充分地进行，当然越是有利于制定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二）对必須作出决定的实际工作問題，在民主討論、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根据职权的規定，由有关的行政和技术领导机关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凡是規定必須执行的，有关的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地执行，不能因为在学术上、技术上抱有不同的見解，而各行其是。如果因为在科学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容許在工作中不按行政的决定办事，那当然是不对的。（三）作出决定以后，在有关的工作人员切实遵守决定的前提下，仍然容許有人保留和繼續提出不同的意見，甚至反对的意見，仍然容許不同的見解、方案、学派进行研究、試驗、自由討論。如果因为工作上有了行政的决定，就不容許学术上的自由討論，当然也是不对的。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决定，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須根据实际經驗，根据条件的变化，根据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来不断地加以补充，使它更加完善。如果发现有些决定錯了，就应该及时改正。因此，对于执行中的各项技术政策和措施，广大群众、工作干部、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提出各种批評和建議，总是有好处的，总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在决定一項技术政策和措施时，作出的各项結論，都是工作上的結論，而不是学术上的結論。在工作上已經按照某种学术見解作了决定，并不等于学术問題的是非已經有了判定。学术上的是非，应该而且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討論，通过实践的考驗才能解决。

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的决定和执行，是一个复杂的問題。在我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有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在各个地区間，有人力物力财力条件的不同，自然資源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些不同的条件，充分



利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能简单化；还要注意因时因地制宜，有必要的灵活性。

一项技术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好的，在另一种条件下，不一定是好的。例如，在水利工作中以蓄为主，在某些山区是好的，在某些平原地区就不一定是好的。有些不同的技术措施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同时采用，相互补充。例如，在森林更新的方式上，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的关系有时就是这样。

在推广先进的技术措施的时候，对于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建议、宣传、示范和提供各种条件的办法来提倡，而不能采取命令的办法来推广；对于全民所有制的工业生产，也要区别情况，有些事情只应该采取建议、示范的办法，有些则需要下命令执行。无论是哪种情况，又都必须经过试验，证明可行，才能推广。同时，在技术上，有些是重大的方针性、政策性问题，是关系重大的措施，需要由一定的上级机关讨论和决定；有些则是执行中的具体技术措施和技术管理的问题，应该根据职权的规定，由有关的技术人员负责决定和执行，其他人不要加以干涉。总之，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条件和情况，才能使技术政策和措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在讨论、制定和执行各种技术政策和措施时，怎样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在有关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讨论中，怎样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制定和执行技术政策和措施中，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怎样保持必要的一致性和灵活性，——对这些问题，各个生产和建设部门几年来都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在需要总结这些经验，细致地研究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使这些原则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

各个生产和建设部门，应该积极组织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讨论。特别是那些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上又比较成熟的问题，更要抓紧进行试验研究和讨论，争取早日取得积极的成果，以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在吸收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问题的讨论时，应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 and 进行考察、试验的条件等等。有一些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研究和讨论，如某些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涉及到几个生产部门，需要由有关的领导部门进行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机关和学术团体，也应该把组织科学技术人员参与技术政策和措施问题的科学研究和讨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①。积极地开展关于技术政策和措施的科学研究和讨论，在这种研究和讨论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可以使我们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更加先进，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于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更加符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問題

汝 信

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是关涉到主体和客体、人和周圍世界的相互关系的重大哲学問題。这个問題和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不仅具有理論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曾經引起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們的热烈探討。但是在馬克思主义哲学誕生以前，这个問題从来没有得到正确而彻底的解决。为了系統地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說明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的偉大历史貢獻，有必要对以往的哲学史作一个簡略的回顾。

* * *

在西方哲学史上，严格地說，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近代才出現的哲学概念。西方哲学思想肇始于奴隶占有制时期的古希腊。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認識处于幼稚的神話时代，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微弱，因此，人們对主体和客体之間的关系还缺乏明确的理解，还不能在真正科学意义上提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們，不論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是当时社会的統治階級，即奴隶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他們脫离生产劳动，鄙視物质生产实践，把脫离

实践的純理論活动奉为最高的生活理想。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最高幸福，在于观照所謂理念世界^①。另一个古代偉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認識或观照置于实践行动和創造之上，把它看作最高級的人类活动。在他看来，理性的沉思活动是“人的最完滿的幸福”，因为它“既有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②。这种靜观的哲学观点，在当时进步的唯物主义者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例如古希腊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德謨克里特就认为，平靜安泰的生活是人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③。显而易见，古希腊哲学的这种靜观性质，使它不可能认真地探討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

应该指出，我們在个别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关于形式和质

① 参閱《柏拉图文艺对話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76—178、284—287頁。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学》第10卷，第7章。見《古希腊羅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7頁。

③ 参閱《古希腊羅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頁。



料的学說中，把形式看作积极的、能动的本原，似乎由于形式的作用，才使包含在消极的质料中的可能性轉化为现实。比如說，建筑材料（质料）之所以成为一座建筑，是由于建筑家的設計图（形式）的作用。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他对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素朴的理解。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謂形式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一切存在的本质，而不是专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归根到底和神学的目的論观念結合在一起，他认为神是“一切形式的形式”、“第一推动力”。因此，我們很难說亚里士多德已經明确地認識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

大致說来，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中世紀哲学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經院哲学占統治地位、宗教蒙昧主义势力横行的条件下，哲学淪为神学的侍婢。經院哲学家們大多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他們极端鄙視自然，鄙視物质实践，甚至連带到鄙視肉体。他們沉溺于抽象的思辨和煩瑣的形式主义的爭論，鼓吹禁欲主义，追求“灵魂解脫”和神秘的内心生活。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的支配下，一切都被归結为上帝的安排，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几乎完全被抹煞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明确地提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是在封建制度开始崩潰、资本主义关系初步形成的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們，对封建主义及其思想支柱經院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們尖銳地批判了宗教哲学家們脱离实际、蔑視自然和貶低科学知識的观点，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論准备。他們反映当时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新兴

资产阶级的需要，强烈地要求認識和支配自然，提倡实践，宣傳科学精神。这样，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了。

一般认为，十七世紀的英国著名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是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強調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家。馬克思把他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現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績。

“知識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培根推崇知識，強調知識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知識是人們駕馭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源泉。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缺陷，就是它的思辨的、靜观的性质。培根反对脱离实践的空談，要求知識服务于实践。他认为人类应该确立大志，凭借科学知識的帮助，努力扩展人类对于宇宙的权利和統治，也就是說，他要求人們尽可能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去掌握知識，征服自然。因此他謳歌一切发明創造，把它看作是最高貴的人类活动；他鼓励人們破除迷信，大胆追求科学知識，反复強調知識的偉大威力；他号召人們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

作为唯物主义的捍卫者，培根闡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那就是，人要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必須以認識客观規律为前提，必須充分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才能收

^① 《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頁。



到实际的效果。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奴隶，但要驾驭自然，首先必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各种规律。因此，对自然的正确的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真正基础。他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因为原因如果没有知道，结果也就不能产生。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①这些话表明，培根已经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并且指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可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培根的很大贡献。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培根虽然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他的理解却是朴素的、直观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实践的理解还很狭隘。他所承认的实践只限于科学实验，只是单纯的技术活动，他不了解广泛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因此，在他那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要限制在科学实验室里。尤其是，培根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探讨主观能动性，所以他不能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培根的哲学观点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②，承认“双重真理”，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这也妨碍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更高的理解。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培根的后继者没有进一步发挥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在主客观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着机械决定论的看法。无论霍布斯、洛克或者斯宾诺莎，他们都片面地强调自

然对人的制约作用，忽视人对外部世界的反作用。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的第一个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是把力学的比例尺用于化学过程和有机界的过程，广泛地用纯粹机械的原因去解释各种现象。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拉美特利写过一部以《人是机器》为题的名著，在他看来，人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③。这种把人看作机器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间得到了普遍的支持。霍尔巴赫认为可以用纯粹的机械作用来解释各种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而狄德罗则把人叫作“由血肉组成的机器”，似乎人与铁制机器的区别，仅在于人是由血肉组成的，人在运行时是有意識的。应该承认，这种观点在当时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可是把人当作机器，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人看作纯粹由外力刺激所推动的被动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片面地夸大对周围世界的消极的承受性，而忽视人的积极的能动作用。

法国唯物主义者强调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界的创造物，他生活在

① 《新工具》。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页。

②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③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65页。



自然界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不能摆脱自然界，甚至他的思想也不能超出自然界。就承认客观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这一方面来说，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只是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的决定作用，没有注意到人们也能依据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面。

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完全由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印象而引起，人们在行动时，表面上似乎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却只是一系列外部原因支配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服从于自然界的铁的必然性，人的意志不能影响事物的进程，一切都已经预先决定。这样，他们就由反对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说”，而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

从机械决定论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宿命论。大多数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宿命论者。这种宿命论的倾向在霍尔巴赫的巨著《自然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命中注定的”。他这样写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或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像在自然界发生的或我们认为自然界所造成的一切一样，都归于必然的原因，这些原因按照必然的规律而起作用，产生必然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产生另一些结果。命中注定性，这就是在自然界建立的永恒的、不动的、必然的秩序……支配物理世界运动的必然性，也支配着精神世界的一切运动，因此，精神世界的一切也都是命中注定的。”^①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非人力所能影响，那末谈论人的主观

能动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贯彻在他们的哲学学说的各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他们大多坚持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立场，把整个认识过程归结为通过我们的感官被动地从外界接受印象，消极地反映外部世界的过程，而忽视了人在高级认识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上的能动作用。在社会伦理学说方面，他们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不理解环境是可以由人来改变的。正因为不能正确地解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所以他们终于陷入无法自拔的循环论：一方面认为，“意见支配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意见单纯是社会环境的结果，最后不得不到“人性”中去寻找出路，沦为唯心主义的俘虏。总之，他们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们不可能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应有的估价，对周围世界采取了消极直观的态度。

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相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着重探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可以说，这个倾向是从康德开始的。

康德的所谓“批判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在研究人的认识之前，必须先对人的认识能力作批判的考察。康德企图脱离具体的认识过程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黑格尔正当地讽刺说，这是教人在下水以前学会游泳。

^①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1777年法文版，第173—174页。



康德的观点虽然极其錯誤，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即認識主体在認識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問題。

康德认为，人們要認識自然，要受教于自然，就必须接近自然，可是理性不能听任自己为自然所支配，它受教于自然，决不能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唯教师之言是听，而要充当法官，强迫证人回答它自己所提出的問題^①。这也就是说，人在認識过程中不应当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应该积极地發揮主观能动性。

康德在認識論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断定說，客观事物本身，即所謂“物自体”是我們永远不能認識的，我們只能認識現象，而这个現象世界則是人的意識的产物，認識的对象是由主体的主观認識能力和創造活动所創造的。康德強調的是“意識从其自身产生观念的能力，認識的主动性”^②，他把它叫做知性。在他看来，物本身并没有什么規律性和因果联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知性形式加在物身上的，因此知性是真正的“自然的立法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康德虽然重視人在認識中的能动作用，但把这种作用片面地夸大到荒謬的程度，以致把許多客观存在的東西都歪曲成主观的产物。

一般說来，康德也主張实践，他认为实践理性与純粹思辨理性相比是占着优先地位的，因为“一切利益終归属于实践范圍，而且甚至思辨理性的利益也只是有条件的，并且只有在实践运用中才能圓滿完成”^③。但是，康德所說的实践只局限于抽象的道德意識的活动范圍內。他強調人在实践中的主动

性，反对被动性，指的只是人在道德方面的自由的“自律”，也就是说道德律的遵守出于人們的自由意志，不带任何利己的动机，也不問效果如何。康德的这种脱离现实的空洞的道德說教，正是当时怯懦的德国资产阶级不敢真正地参加社会革命实践而沉溺于自由的幻想的絕妙写照。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談論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也就不能不带有极端抽象的性质了。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个著名代表費希特，在探討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比康德走得远一步。

費希特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疇就是行动。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只是自我意識的实现，因此应该从“自我”出发。“自我”不是存在，而是行动，它是絕对的、毫无任何限制的东西，它不是事实 (Tatsache)，而就是行动本身 (Thathandlung)。費希特高唱：“行动，行动——这就是我們存在的目的。”^④

在費希特那里，这种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強調，是同他的整个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密切結合的。在他看来，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的“絕对的自我”是絕对无条件的，不为任何更高的东西所决定。“絕对的自我”的

① 参閱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文，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頁。

②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学》，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30頁。

③ 参閱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館1960年版，第124頁。

④ 費希特：《論学者的使命》，1935年俄文版，第63頁。



第一个行动就是设定自己，但要使“自我”的活动成为自觉的活动，就必须遇到反作用。因此，“绝对自我”的第二个行动就是设立“自我”的对立面：“非我”，亦即人周围的整个客观世界。费希特认为，“自我”与“非我”的对立、主客体的对立，完全是通过“自我”的活动才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存在于“自我”之中。这样，“自我”就成为整个世界和永恒运动的唯一来源，一切都决定于“自我”的活动和意志，因此费希特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我论和唯意志论的泥沼。

从上面可以看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费希特极端夸大了，甚至被他説成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实的客观基础完全被他取消了。费希特的错误不仅在于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且还在于把主观能动性看作纯理论的精神活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指出，费希特的“自我”无非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①。因此，费希特所说的那种“自我”的能动性，也始终没有能超出精神、自我意识的范围。

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更深刻的探讨，应该说，黑格尔对于主观能动性的理解是比他的先驱者们更接近于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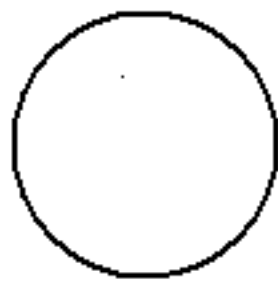
早在《精神现象学》一书的著名的序言中，黑格尔就已发挥了绝对即主体的思想。在他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②，而活的实体，只有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它才真正是主体。在

这里，黑格尔是针对斯宾诺莎而言的。黑格尔批评斯宾诺莎的实体只有客观性，缺乏能动性，因此他用唯心主义观点改造了斯宾诺莎的实体，把实体说成是主体。作为主体的实体，本身是积极能动的，它从自身中树立起对立面，自身分裂为二，异化为客体，然后又克服这种异化，征服客体，在这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大家知道，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指的是自己发展的“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活动的本原、能动的力量。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它表现为逻辑概念的发展；在第二个阶段上，它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异化”为自然；最后在第三个阶段上，又扬弃这个对立面而回复到自身，终于达到了自我认识的目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主体凭着自己的力量发挥能动的创造作用的结果，精神从自身中“异化”出自自然界，最后又把自然界“据为己有”。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就是描述精神的这个自己运动的历史。

黑格尔认为，人不仅要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宰制”世界。他说：“人类的努力，一般地讲来，总是趋向于理解世界，能自己适应并宰制世界，目的总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符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页。



合自己的准则。”^①在《逻辑学》里，黑格尔以非常抽象晦涩的形式，表述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在理论活动中，人们主要是研究客观世界，获得知识，以纠正自己的主观片面性；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就要按照自己的观念来改造客观世界。在他看来，理论和实践应该是统一的，绝对理念便是“理论和实践的理想的统一”^②。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唯物主义的改造：“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

黑格尔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认为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他看来，由于思维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它可以转化为存在，又从存在返回到自身，这种转化正是人、精神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明显表现之一。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坚持精神第一性的原则，把存在统一于思维，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反对把思维和存在绝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的辩证法思想，却包含着“合理的内核”。所以列宁说：“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④

黑格尔对于人的活动和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解，例如他在研究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时，指出必然性的三个环节是：条件、实质和活动。有了条件和实质，还必须通过活动才能使实在的可能性

变成现实；反过来说，活动之所以可能，也仅仅是由于有了条件和有了实质。黑格尔写道：“活动仅是一种从条件里建立起实质（实质本来潜伏在条件里）的运动”^⑤。这就是说，人的活动是离不开客观条件的，然而单具备了客观条件而不经过人的活动，可能性仍然不会转化为现实。这个看法确实是相当深刻的、辩证的。

但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真正科学的解释。问题在于，“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将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⑥正因为这样，黑格尔哲学就有着“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⑦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他那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整个客观世界、客体只不过是精神、主体的“异在”，因而出现在主体面前、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只是主体自身，即“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这样看来，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归根到底始终只是在主体的自

①② 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33、421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229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⑤ 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18页。

⑥ 《资本论》第2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435页。

⑦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页。



我意識的範圍內進行，始終只是思辨的實踐活動。

黑格爾對勞動的理解，也說明他未能正確地解釋人的主觀能動性問題。馬克思曾經指出，黑格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認識到勞動的本質，把對象化的人……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但是“黑格爾所認識的並承認的勞動乃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①。因此，儘管黑格爾看到了勞動在歷史發展和人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可是他所理解的勞動，不是具體的社會生產實踐，而只是思維活動，只是自我意識使自己“異化”為對象又克服這種“異化”的精神活動。由此可見，人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的真正的主觀能動作用，仍然是黑格爾所沒有理解的。

黑格爾哲學的批判者費爾巴哈，拋棄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傳統路線，而重新恢復了唯物主義的“王位”。費爾巴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學說，並且比他們更前進了一步，可是他的人本主義哲學，沒有擺脫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缺陷。

費爾巴哈不再把人當作機器，這確實是一個進步。但是，“費爾巴哈談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②。他所說的人，指的是自然的、“一般的人”。因此，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純粹自然的關係、即兩性關係外，就只有“愛”和“友誼”。他只看到生物學的人，而看不到社會的人。這樣，他當然就不可能理解人們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意義。

費爾巴哈也談到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

作用，但是他把主體、人只看作“感性的對象”，而不看作“感性的活動”。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不理解，人的感性活動，即不斷的勞動和創造，乃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在他那裡，人對周圍客觀世界始終只採取感性直觀的態度，似乎人不能改變和創造對象，只能觀察和使用對象。因此，從根本上說，人在自然界面前仍然處於被動的地位。

費爾巴哈所以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歸根到底是由於他不理解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係。當然，他有時也談到實踐的作用，例如他說過：“理論所不能解決的那些疑難，實踐會給你解決。”^③但是他把實踐狹隘地理解為人們之間的生活關係，而且他總是貶低實踐活動，把它放在理論活動之下，認為“理論的直觀……是令人喜悅的、令人滿足的、幸福的直觀”，而實踐的直觀則是“一種不純潔的、被利己主義沾污了的直觀”^④。因此，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他“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⑤。

① 馬克思：《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15頁。

②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頁。

③ 《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248頁。

④ 《基督教的本質》。《費爾巴哈全集》第6卷，1960年德文版，第237頁。

⑤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頁。



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們，無論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上抱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观点。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綱》中，曾經对这段历史作了概括，他說：“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①在这里，馬克思指出了以往两个基本哲学派别的缺陷：旧唯物主义者对客观世界持感性直观的态度，因而忽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些唯心主义者虽然強調了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却又对它作了抽象的、歪曲的解释。彻底糾正他們的錯誤，对这个問題作出科学的辩证唯物的答案，这个历史任务是由馬克思主义担負起来的。

* * *

由于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伴随着它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的出現，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革命实践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馬克思主义。人們第一次可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科学地理解客观規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

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問題上，馬克思主义

和以往各种哲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反，馬克思主义在肯定“物质先于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的基本前提下，充分強調精神对物质、意識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經指出，人在对自然的关系方面不同于一般动物，动物只能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以自己的存在来改变自然界，它們作用于周圍环境完全是无意識的；而人則逼使自然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对自然界的作用带有經過思考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性质^②。人不是消极无为的生物，他不仅有意識地积极改造自然环境，而且也有意識地积极改造社会，同时也就改造了他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認識論方面，馬克思主义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思維、意識是存在的反映，否认它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因此他們所主張的是消极的反映論。馬克思主义者則把辩证法彻底应用于認識論，认为思維、意識不仅是存在的反映，而且对存在可以起巨大的改造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的主要的作用），可以能动地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而轉化为存在，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論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論”。在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中，認識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頁。

^② 參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145頁。



和实践是辩证地统一的，而在认识和实践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毛泽东同志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第二，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相反，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同时，着重指出这种能动作用必须符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唯心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不是根本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便是把规律胡说成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或“方便假设”。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这种荒谬观点，认为无论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既不能为任何人所创造，也不能为任何人所废除。这种客观规律的存在，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实基础，只要离开了这个基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向坏的方面转化，变成主观盲动。列宁教导我们说：“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②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条件。只有认识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才能在人的活动中运用这些规律，以达到预定的目的。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所制约的。唯心主义者不顾客观条件来谈人的主观能动性，结果往往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片面地夸大到荒谬的程度，仿佛一切都取决

于人的主观意志，人可以为所欲为。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唯意志论观点，指出了它的严重危害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条件，只有充分估计到必要的条件，从现有条件出发，利用现有条件，并根据客观规律去创造那些可能创造的条件，才能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③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正确的行动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根据，而思想则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应有正确的行动，而且应有正确的思想，即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的认识。因此，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态度，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前提。

第三，与以往一切哲学体系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局限于脱离实践的抽象思辨的领域，不能局限于个人的理智活动，而首先应该表现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过去的哲学家不是根本看不到实践

①③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468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页。



的作用，便是停留于对实践作抽象的、直观的理解，他们都不能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具体考察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都不能真正地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的统一。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对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循环往复的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第四，与以往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不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个人的范围内，而把它首先理解为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和社会阶级斗争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唯心主义者以及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旧唯物主义者，都不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所以当谈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至多只是指“杰出的”个人的能动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充分承认杰出人物在体现历史发展趋势时所起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则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在革命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僧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③，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以承认人民群众的革命

的能动性为基础的，而党的领导则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整个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科学、唯物辩证的解释。但是，直到如今，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还在竭力散布一种早已破产了的神话，诬蔑马克思主义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只有冷冰冰的物质、规律，没有人的地位。例如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忽视人的主观因素，把人弄成“公式化的图式的傀儡”，并叫嚣说要用存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恢复”人的地位，把“主观性因素”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这种资产阶级学者的陈词滥调是不值得一驳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革命的实践中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到应有的高度。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群众，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能够遵循着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③ 《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試驗和推廣

李守璋 李學昆

一切經過試驗，試驗成功了再有步驟，有區別、分期分批地推廣，這是我們黨一向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人們在變革自然和變革社會的過程中，常常要提出一些新的設想、方案或措施。這些設想、方案或措施，一般地是經過了調查研究，集中了群眾的已有經驗，或者根據一定的理論提出的。但是，它們在實現之前，總是屬於主觀的東西。要證明主觀的東西是否符合客觀，在主觀的範圍內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只有把主觀的東西付諸實踐，通過實踐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才能證明它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毛澤東同志說過：“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① 列寧也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實踐不僅有普遍性的優點，並且有直接的現實性的優點。”^② 試驗，就是一種具有直接的現實性優點的實踐。

試驗，總是在一定範圍內小規模地進行的。在試驗的過程中，人們可以集中精力，對自己的設想、方案或措施的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根據試驗所提供的材料，不斷校正和補充自己的認識，使原來的設想、方案或措施更趨於完善。同時，

正因為試驗是一種小規模的實踐，即使原來的認識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它所造成的損失也不會很大。

任何設想、方案或措施，在付諸實踐之前，人們不僅對它的正確性沒有把握，而且對於如何把它變為現實也沒有經驗。經過試驗，人們總結了實踐中的經驗，進行了分析比較，就有可能摸索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實現自己的設想、方案或措施的具体方法。當然，這裡所說的經驗，既包括成功的經驗，也包括失敗的經驗。成功的經驗，從正面告訴人們應該怎麼做；失敗的經驗，從反面告訴人們不應該怎麼做。

試驗也是用具体事例對群眾進行宣傳工作的一種形式。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最相信他們自己看到的和亲身体驗到的東西。列寧曾經說過：“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實際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我們應當拿出具体的例子來證明‘康姆尼’（共產主義——引者）是最好的東西。”^③ 經過試驗，擺出樣子，就可以用具体、形象、生動的事實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頁。

③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頁。



教育群众。例如在試驗田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措施，如果取得了增产的效果，群众自然就会相信。用这种实例进行宣傳，是最有說服力的。

我們党和政府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一切号召和倡議，总是給予极大的信賴，这就要求我們每提出一項新的方案或措施的时候，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坚持一切經過試驗，证明确实行之有效以后，再普遍付諸实施。这才是对群众負責的表现，才能把事情办好。

在实际工作中所进行的一切試驗，都是为了推广。在一点上的試驗，如果取得积极成果，就要推广到其他点上去，这是在进行試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的。这里，有两个問題值得注意：一个是进行試驗的条件选择問題，一个是試驗中的群众路綫問題。

任何試驗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在某一些条件下，試驗会得到一种結果，在另一些条件下，試驗会得到另一种結果。試驗既然是为了推广，那么，就应该十分注意試驗条件的选择，使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样，当試驗获得成功的时候，試驗的成果就能够在比較大的范围里推广。相反，試驗条件如果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或者人为地創造一些特殊的条件，来进行試驗，即使試驗获得成功，試驗成果也不易于在比較大的范围里推广；如果勉强推广，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遭到失敗。

为了使試驗的成果能够普遍推广，試驗往往需要多点进行和多次进行。多点試驗，就是选择几个具有不同条件的点同时进行試驗。这样做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地方的主

客观条件錯綜复杂，个别点的条件常常不能完全代表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条件。条件愈优越的地方，試驗就愈容易成功。但是，如果把这个地方的試驗成果拿到条件差的地方去推广，就会遇到新的困难，甚至根本行不通。在某些条件不好的地方，虽然有創造新的条件的可能；但是創造新的条件也有难易的不同。把容易創造新条件的地方的試驗成果，拿到不容易創造新条件的地方去推广，也会遇到新的困难。选择几个点同时进行試驗，就可以取得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經驗，使經驗更全面、更丰富，又可以把不同經驗互相比較，更加准确地观察这种試驗的正确程度和适应范围。多次試驗，就是在一个点上或者几个点上反复进行試驗，在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观察試驗結果的正确程度和适应范围，并且通过反复的試驗使經驗不断深化。

我們在实际工作中所进行的各种試驗，都是小范围内的群众实践。試驗如果离开了群众，閉門造車，那是不会有好的效果的。只有和群众在一起进行試驗，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并且尽可能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在試驗过程中，认真地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見，試驗才会有好的效果，也才能使試驗的过程同时又是教育群众和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才有利于試驗成果的推广。和群众一起进行試驗，不仅领导上可以取得經驗，群众也同时取得了經驗。这样，群众就对試驗成果更有信心，把它看成自己的东西，积极主动地去推广。因此，在試驗中要自始至终地走群众路綫。

群众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我們所要試驗的新方案、新措施，虽然一般地是突破了群众已有經驗的东西，但是它們仍然不能离开群众的已有經驗。因为这些新方案、新措施，或者本身就是集中、提高了的群众經驗，或者需要与群众經驗結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試驗中應該十分重視群众的經驗，認真听取群众的意見。群众对于新的事物，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經驗，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意見，有的贊成，有的怀疑，有的甚至加以否定。不論何种意見，我們都應該虛心听取，認真分析，吸取其合理部分，以修正或充实新方案、新措施。对于怀疑和否定的意見，也要容許提出和保留，因为事情既然在試驗，其正确性就还待证实。群众中的正确的意見，固然有利于試驗的进行；群众中的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意見，有时也会有助于促使試驗更深入更扎实地进行。試驗成功了，群众就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这时群众中的一些思想問題也就会比較容易地得到解决。

試驗是推广的先决条件。但是，試驗成功了，还只是有了推广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推广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注意。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項試驗成功以后，在推广中，有时得到成功，有时却不能完全成功，甚至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小規模的試驗中证明可行的东西，在大規模的推广中不一定是可行的。所以，在試驗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推广的时候，仍然要采取极其謹慎的态度，看到試驗成果的一定的局限性。

試驗成果的局限性，首先是指它的适应

范围是有限的。在一定条件下試驗成功的东西，只能在条件大致相同的地方推广。我們應該很好地研究試驗的成果，分析它产生的条件，本身的特点，然后經過細致的比較，决定哪些地方可以推广，哪些地方不可以推广。例如，在南方試驗成功的增产措施，就不能随便搬到北方去推广，在山区試驗成功的經驗，也不能随便搬到平原地区去推广。如果客观上确实有把試驗的成果推广到条件不同的地区去的必要，那么在推广之前就需要再次进行試驗，取得在条件不同的地区推广的經驗。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試驗成功的东西，只能在相同的条件下推广，絕不是說只能消极地适应条件。有些条件，經過一定時間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的。如果条件基本上具备，而某些不利的条件經過努力又能够改变，仍然應該积极做好工作，进行推广。

試驗成果的局限性，同时也是指試驗成功的东西，仍然会存在着某些缺陷。这是因为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認識也是发展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人对事物的認識总有它的局限性。只有通过反复的實踐，人对事物的認識才能逐步完善和深化。因此在推广的时候，不應該貿然全面鋪开，而要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使上一期上一批的推广，对下一期下一批的推广來說，又是較大范围内的試驗。这样穩扎穩打，逐步推进，就能使試驗成果在實踐中不断完善，而且經過不断的总结，經驗也会愈来愈丰富。在推广中采取这种循序漸進的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工作的进展很緩慢，其实并非如此。过去我們党领导进行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都是經過試驗，积累了經驗，根据主客观条件，制定出



分期分批推广的计划。推广一批，总结一次经验，再推广一批，再总结一次经验，波浪式地前进。每经过一次实践，我们就学会一些新经验，使推广的进程愈来愈快，愈来愈健康，从推广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并不缓慢。进行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我们所面临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耕作习惯不同，在这方面要推广一些新措施、新办法，更要注意分期分批地进行。

要把推广工作做好，同样要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推广不同于试验，它是规模广阔的社会实践。试验成果的推广，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在推广中必须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依靠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果群众还不能接受，就要耐心等待，继续进行说服教育。只要试验成果本身是正确的，在客观上是符合群众需要的，它就一定会在实践中逐步为群众所接受。

试验的成果被群众接受以后，在广泛实行的过程中，还需要倾听群众意见，深入扎实地做工作，具体解决各种问题。对于新方案、新措施的推广，群众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特点，提出一些补充或修改意见，或者提出符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做法。对于群众的这些意见，应该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新方案、新措施在具体条件下采取什么具体方法去实行，应该给群众以选择的余地。

一切经过试验，试验成功了再分期分批地推广，这种工作方法，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边疆」和「全球战略」的真谛

陈原

“新边疆”

美国的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泰国——这样，就给肯尼迪一直在吹嘘着的“新边疆”精神，又一次作了明白的注解。

本来，走向“新边疆”，是指美国发展史上开拓几乎没有人烟的西部荒原，现在却被肯尼迪拿来作为美国统治集团向外扩张的代用词，显然，这是不伦不类的。但是，既然这位据说是爱好词章的总统，新近仍然大书其文章来鼓吹这种“精神”，人们也就不得不问一问，他所谓的“新边疆”，究竟是在何方；那些“探索着”这“新边疆”的“未知的道路”的“拓荒者”，又是什么样的一些脚色？

各式各样的美国垄断资本家和他的喉舌，都曾经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有一位游历过非洲的美国轮船公司老板曾洋洋得意地宣称：“若论做生意和投资，则美国的新边疆是在非洲。”又如，纽约出版的《商业周刊》说，对刚果特别感到兴趣的，只是美国钢铁公司，联邦人造纤维公司，麦地逊化学公司，美孚油公司等等。那么，对这几家垄断资本的大亨们来说，“新边疆”无疑是在刚果。但是对于西屋



电公司，美国铜公司，大通国际投资公司的股东们，照同一个杂志的材料来判断，他们要“奔向”的“新边疆”却又到了东尼日利亚……。依此类推，我们对于“新边疆”的涵义，就可以“思过半矣”。

为美国统治集团的“新边疆”政策四方奔命的“拓荒者”是谁？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脚色呢？肯尼迪也早就宣布过，是那些被肯尼迪一再夸奖过的“宇宙航空员、和平队、武装部队中的男女和许多美国人”。据肯尼迪说，这些美国人——不，这些“拓荒者”不仅比其他美国人“更具有美国味”，而且他们那种“征服”、“冒险”的“优秀的品质”，还使他——这位热中于开辟“新边疆”的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哩。

肯尼迪利用“宇宙航空员”来作为开辟“新边疆”的“拓荒者”，难道是他打算将几个州的人口迁移到月球上去“拓荒”吗？当然不是。原来在美国政客的语汇里面，“宇宙航空员”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借词”，它的真正涵义应该是侦察火箭、洲际导弹和间谍飞机之类。如若不信，有史为证：当一九六〇年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之后，最初出来发表声明的是一个被称为“负责美国空间计划的非军事性的机构”——美国全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这个所谓“非军事性的机构”煞有介事地说，被击落的U—2飞机“不过”是一架“考察飞机”，它在进行一项“研究高空所发现的阵风气象条件的连续计划”时，“由于供氧困难”而迷失道路了。可是，偏偏那个间谍飞行员还活着，这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赶紧出来取消了这家“非军事性的机构”的声明。这段历史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所

谓“宇宙航空员”这种“拓荒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在“拓荒者”的队伍中，有一批是受到肯尼迪特殊看待的、手里摇着橄榄枝的所谓“和平队”。据美国报刊说，这是一群特选的富有“美国味”的青年男女，他们到“不发达国家”的“穷乡僻壤去跟老百姓直接接触”，但“他们不是去建筑水坝或公路”，而是去教会那些“低级种族”怎样才能达到美国式的民主和如何实现美国生活方式。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承认的，使肯尼迪“深受感动”的这批“拓荒者”要“拓”的“荒”，有一部分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传教士所已经做过的”，但是“和平队”的“勇士们”，却又尽量“避免与宗教活动联系”，要将自己打扮成为“落后”民族的“真正”朋友，也就是说，他们将要“开拓”同殖民主义有密切联系、而为现在觉醒了的人民看穿了的美国反动传教士所难以“开拓”的“荒原”。对此，几内亚《自由报》在一篇评论中曾经指出：“美国‘和平队’的成立以及建立与此相应的经济机构，这些都是美国辛迪加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活动的辅助组织。这也是执行全球战略的辅助组织，因为，这些‘和平队’旨在心理上为美国扩张政策准备土壤。”可见，“和平队”——美国“新边疆”的“探索者”，只不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行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传教士，是美国垄断资本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和推行扩张政策的一种工具。

怎么武装部队也算得上“拓荒者”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立即可以联想到美国分布在各大洲的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和美国向海外派出的一百多万军队。试问，这些“拓荒者”



又能“拓”什么别的“荒”呢？这不明摆着是要把世界各国都变成华尔街和白宫所要“不断前进地”奔向的“新边疆”吗！尽管美国统治集团像俗话所说的“丑人多抹粉”，用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巧立名目，说什么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遍设军事基地网是为了“保卫这个地区的安全”和“承担义务”，在欧洲驻扎三十万军队是为了“保卫欧洲的自由”和“加强欧洲的防务”……等等；但是，名目虽多，归根到底，还是肯尼迪自己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将追求的目标”是“使我们认为符合各地人民基本愿望的一种政府制度有可能最后普遍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他要向全世界进行侵略。现在，肯尼迪又下了命令，把一批“拓荒者”——武装部队送到远离美国太平洋海岸一万英里的泰国，这就更戳穿了肯尼迪所谓“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边疆”的谎言。泰国就在中国以南，就在老挝和越南南方的近旁，他们要到这个地区来“探索”什么“未知的道路”，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

由此可知，肯尼迪式的“新边疆”精神，不过是武装侵略与和平渗透的代名词。关于这一点，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使用的“新边疆”这个术语，它原来所包含的“社会创造力”，已经是不存在的了。什么“新边疆”，什么“拓荒者”，不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臭名昭彰的“全球战略”么！

“全球战略”

被称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侵略蓝图，据说已由前白宫的军事助理、现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华尔特·罗斯托博士拟

好了“草案”。四月九日纽约《新闻周刊》报道，这部厚达两英寸，长达二百八十五页，用浅蓝色封面装订起来的“全球战略”，现在已经放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高级官员们的桌子上，等待着他们“批注意见”了。

这位罗斯托博士的“全球战略”包含些什么内容呢？不久前，他在美国帕都大学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为题所做的演讲中，提出了五点方针，关于这五点战略方针，他前前后后说了千言万语，但究其实质，不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美国统治集团策划如何对付世界上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和国家。

尽人皆知，作为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的美国，它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对手“消灭”。罗斯托现今开出的药方，并没有多少新鲜玩意，请看吧：

“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这是一九五八年杜勒斯打的如意算盘；

“我们必须为东欧准备好一套更灵活和更现实的做法”——这是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提出的主张。

罗斯托的“战略”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拟订的具体方案，即：既要准备“寻找同共产党政权有一致利益的有限的领域”，同时还要“耐心地”促进“那种缓慢的演变性的发展”。如果把这些晦涩、曖昧的话用普通语言翻译出来，那就是：一面搞谈判，一面搞颠覆。

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战略”是“结成新的伙伴关系”，“互相依靠”。用罗斯托的说法，那就是“加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



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資本統治的世界，各国統治階級間的“伙伴”关系，其实只是一种明爭暗斗、弱肉強食的关系。照美国的如意算盘，所謂“工业化程度較高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必須循着这样的公式来建立的：美国是主人，其他国家是仆从。用《紐約时报》的話來說，就是美国應該“作为盟国的領袖”，“盟国”應該“忠誠地追隨于后”。肯尼迪政府这一年多以来跟它的西方“伙伴”，就是企图維持这样一种主与仆、领导与追隨的关系，而西方各国却誰也不甘心作美国的仆从，因此对美国的不满是与年俱增的。試举一个例子。美国以为靠着它的“无可比拟”的核力量，就可以“威懾”西方“伙伴”，要他們同自己建立上面提过的“伙伴”关系，但正是在这个核問題上，伙伴們都不买賬。新近在雅典举行的以討論核問題为中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部长會議，就证明了西方的部长們“在自己之間发生了尖銳的分歧”。按照倫敦《泰晤士报》的說法，这个會議“所做的事，是最后地揭穿了所謂‘一致’这雅致的虛构”。在会外，法国戴高乐对于肯尼迪那种壟斷核力量的专橫态度，更是忍不住破口大罵起来了。連战后被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西德，也深为不滿。最近西德《世界报》有篇社論的标题很有意味，那就是“美国站在門口”几个大字！这是为反对美国的“出口攻势”而說的。其实，美国对付它的“伙伴”的“战略”，岂止是“站在門

口”，有的地方簡直已升堂入室，反客为主了。这又怎能不叫那些小“伙伴”們担心呢。

“南半球”的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是罗斯托在他的“战略”中特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条战略中就有两条提到了美国統治集团最感兴趣的这个地区。据罗斯托說，美国决心要建立一条“新的南北紐带”，并且“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南半球”的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根据自己的傳統和願望来建立他們自己的形式的現代社会”。（这句话是弥天大謊。古巴不是正在根据自己的願望进行现代化嗎？为什么它却受到美国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干涉？）又說，“帮助維持这种广泛的现代化过程的完整和独立是我们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利益”。这就对了，美国統治集团不正是在根据它们的利益，运用所謂“爭取进步联盟”之类的圈套来締結什么“南北紐带”的嗎？反映了美国壟斷資本集团利益的博士的“战



“拓荒的勇士們，开步走！”

江有生



略”，其实是不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和国家取得真正的独立，而不过是采用狡猾的手段，戴上一副“友谊”的假面具推行新殖民主义罢了。美国有一位自由主义老教授弗莱明，曾在两卷本的大书《冷战及其起源》中，“感慨系之”地说过一段话，他说：

“我们不是跟一切摆脱殖民统治的人民一起，重新作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国家，一同生活下去，却总是害怕随便什么地方发生任何一种革命。我们不是乐于看到所有古老的封建政权垮台，而是将我们自己放到这

样的一种地位，仿佛要在东欧和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去拯救这些政权，终于死抱着蒋介石、佛朗哥和沙特王不放。我们不是回忆起我们民族年青时代如何向往着中立与和平，而是把许多解放了的民族这种需要加以谴责，说这是一种邪恶。”

这位可怜的自由主义教授不懂得资本主义美国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不懂得这个帝国主义已经活到腐朽的老年，丧钟也已经在为它而鸣了。……但是，这位教授的感慨，却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那就是美国对“南半

“和平革命”的招牌 和殖民主义的实质

· 鍾 国 豪 ·

一九四一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商讨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問題。这两位国家首脑在讨论中曾发生过一场争吵，罗斯福当时这样抨击丘吉尔：“我不知道是你的大臣中的哪一位曾经介绍过一种政策，主张把殖民地国家中的原料财富都搬走，而反过来却丝毫不给这个国家以任何报酬或是代价。二十世纪的方法是把工业介绍到这些殖民地中。二十世纪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给他们新的教育，给他们卫生的设施，以增加这个国家人民的财富，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原料虽被搬走，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得到相等的报酬的。”罗

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分歧似乎是重大的，即：一个主张用“十八世纪的方法”，全部搬走殖民地的原料财富；一个主张用“二十世纪的方法”，一面搬走那里的原料财富，一面“帮助”殖民地人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给予“他们新的教育”和“卫生的设施”作为“相等的报酬”。

丘吉尔的方法，看来好像对殖民主义者更有利，可以任意掠夺财富而自己一毛不拔；但是华尔街的“文明的”垄断资本家，根据他们的掠夺经验却认为，罗斯福的主张比丘吉尔的要“高明”得多。因为尽管花一点钱，却可以替自己搬走财富的恶行盖上一层“相等报酬”的薄纱；甚至还可以向落后国家邀“帮



球”各国的独立，绝不是什么“帮助”，而是决心要加以阻止的。

至于博士所说的美国已经开始同“南半球”国家建立了一种什么“合伙的新基础”，它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呢？《加纳时报》早就指出过，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只是为了“诱骗非洲”才“假装成非洲的朋友和恩人”。这家报纸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假面具能遮盖他们的毒牙，美国已经成了目前正在争取彻底解放的非洲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最近华盛顿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考察了拉丁美

洲十四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后，也作出结论说：“美国的威信在这重要的大陆上迅速降低。……现今拉丁美洲的情况比之一年前美国宣布成立‘争取进步联盟’的时候，甚至更为糟糕。”

博士挖空心思开下的“全球战略”这帖据说又是守势、又是攻势的药方，对于我们认清美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是颇有好处的。华尔街要“征服”世界的“好梦”和肯尼迪要“开拓”“新边疆”的妄想，值得全世界人民引起新的警惕。我们需要擦亮眼睛，看它如何蠢动。

助发展经济”之功，岂不名利双收，堂哉皇也！正是在这位罗斯福总统当政的十多年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拉丁美洲进一步排挤了英、德等帝国主义，并使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润猛增；到罗斯福死后的第三年，他们所取得的利润，便比罗斯福上台前后十年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年）的每年平均数高达三倍。难怪华尔街的老板们把罗斯福奉为当代的“伟人”，当今的肯尼迪总统也把他尊崇为对付南方邻邦不满情绪的“先哲”哩。当肯尼迪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已经极力主张要发扬罗斯福的精神，他说：“罗斯福的睦邻政策是很成功的，因为这种政策表明了对本半球问题的不断关怀。”

也许是受了这种罗斯福精神的启示吧，肯尼迪上台以后，就在拉丁美洲大力推行“争取进步联盟”的计划，今年三月十三日，他在向国会提出的“援外咨文”中，又建议“单独设立一项长期的争取进步联盟基金”，要求“在今后四年对进步联盟提供三十亿美元”，来实现“半球规模的和平革命”。人们知道，三

十年代的罗斯福，是为了平息当时由于美国对南方邻邦频繁的武装干涉而引起的极端不满，挽救华尔街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和倾销商品显著下降的危机，才伪善地提出“睦邻政策”的。如今肯尼迪高唱什么“和平革命”的调子，也是为了消除拉丁美洲人民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他说什么：“如果我们不愿把我们的资源和精力投向谋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任务的话，我们将面临一种严重而紧迫的危险，那就是，绝望的人民将转而把共产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暴政视为他们求得改变的唯一希望。”肯尼迪的所谓“和平革命”与当年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如此酷肖，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肯尼迪上台伊始，曾经忧心忡忡地惊叹拉丁美洲各国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加深”，而一年多来，随着美国对拉丁美洲控制的加强，那里的革命情绪又在与日俱增。不久前墨西哥《永久》周刊曾发表文章，指出拉丁美洲的贫困和落后是美国掠夺政策和大庄园制度造成的，只有革命才是使这个大陆从美



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道路，才能使各国实现现代化，收回富源，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国内市场，实行生产多样化，促进人民教育，推动工业化。古巴人民在这方面已为拉丁美洲各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走古巴的道路”越来越广泛地成了这个大陆人民的呼声。现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巴拉圭等国家的人民，都已被迫拿起武器，与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厄瓜多尔、秘鲁、洪都拉斯、巴西等国家的农民夺地斗争也在不断发展，“美国佬，滚回去”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拉丁美洲……。这到处蔓延着的烽火，真叫白宫和华尔街的那些先生们为之手足无措。尽管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使尽力气，在巴拿马帮助各国反动统治集团大批训练“防止和镇压叛乱”的部队，派遣无数“情报专家”、“游击战战术专家”潜入各国进行颠覆破坏等等活动，但是都无济于事。这就使得以扼杀民族解放运动而臭名远扬的、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不得不沮丧地表示无能为力，他认为：“光用军事力量是不会自然而然击败共产党人的，除非进行内部经济和社会改革。”面对着这种局势，肯尼迪就同“先哲”罗斯福使用“睦邻政策”的手法一样，狡诈地装出一副关心南方邻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样子，并且打出“和平革命”的招牌，妄图阻挡和扼杀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

当然，也不应该抹煞肯尼迪的“独创”。如果以为肯尼迪只是恢复了“睦邻政策”，那就未免有点埋没了肯尼迪的“功劳”。罗斯福只是主张搬走财富时“赐予”殖民地国家以“高的生活标准”、“新的教育”和“卫生设施”；而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则提出要在“本

半球进行和平革命”，让拉丁美洲各国“自己进行土地改革”、“税收改革”，使“命运大部分掌握在各国自己的手中”，“大量外来援助”只作为“提供一种补充”。他甚至还多方面敦促这些国家中的“有钱有势的人们”迅速进行“改革”呢！请看：既主张南方邻邦起来“革命”，又鼓励它们自己“掌握命运”，还慷慨解囊拿出大笔款项“援助”那里进行“革命”，这不是很“友好”的“帮助发展经济”的行动吗？哪里有“把殖民地国家中的原料财富都搬走”的野心呢？

不过，且慢，让我们看看肯尼迪在拉丁美洲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吧：秘鲁是美国政府直接策划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之一，去年肯尼迪也公开表示过要与秘鲁政府“紧密合作”，实现“改革”的计划。可是，“土地改革”计划公布了一年多了，至今由美国公司经营的大庄园，像塞罗德帕斯科公司所属的畜牧场那样全国最大的庄园还依然如故，它们并没有把所霸占的任何一寸土地归还给农民；恰恰相反，由于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庄园主继续对农民进行横暴的掠夺，去年底以来，当地的印第安人就不得不以大刀和弹石作武器，向美国公司展开了夺地斗争。但是，这一正义的行动，却遭到由美国扶植的反动军警一次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就在美国塞罗德帕斯科公司的庄园里，造成了夺地的农民惨遭枪杀和被打伤的事件，激起了秘鲁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那里的大庄园主直至今天还在所谓“土地改革”计划的指导下，用放火烧毁农民住房的办法，大批驱逐农民，扩大土地壟断。哥伦比亚的“土地改革”也是由白宫的先生们一手策划进行的，从拟订计划，组织“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到制定“土地改



革法案”，都得到美国政府的点头“同意”，据说美国还专门给了他们七千万美元贷款，来“帮助”实现这一计划；肯尼迪政府的第二批“和平队”就是派到这个国家“帮助”进行“农村建设”的。然而，这种“土地改革”，不但对美国公司的大庄园没有丝毫触动，就是对本国的大庄园也是严加保护，穷苦农民并没有取得分厘的耕地。而那些整天侈谈“土地改革”的肯尼迪政府的大使和美国将军，却在那里直接策划镇压那些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争取实现土地改革的农民游击队。就此看来，肯尼迪口中的所谓“土地改革”，究竟是种什么货色，不是明白得很吗？

肯尼迪吹嘘所谓“和平革命”，大叫大嚷要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来“援助”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经济”，但是，他的漂亮的言词对拉丁美洲各国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据说，委内瑞拉是肯尼迪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范例”之一，去年由华尔街控制的泛美银行发放的“争取进步联盟”贷款，它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居于拉丁美洲各国的首位。不仅如此，肯尼迪还亲自动手设计呢。去年年底他访问南美时，飞机刚在加拉加斯着陆，便风尘仆仆地转乘直升飞机到弗里奥去主持“建筑四十八家廉价住宅的开工典礼”，还来不及喘息，又飞到莫里塔视察他的“先进土地改革区”。回到华盛顿后，肯尼迪大加渲染，说什么他“在（南美洲的）工人、农民中亲自看到希望在上升”。如此不惜工本陈设的所谓“进步”、“繁荣”的“橱窗”，应该说可以代表肯尼迪的杰作了吧！可是，近年来，在这个国家里，失业和贫困更加加剧了，工人不能忍受美国公司日益加深的残酷掠夺，不断举行大规模罢工，农民为了取得维

持生命的土地，只好拿起枪杆开展游击斗争。在委内瑞拉《号角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争取进步联盟”执行一年后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分析：“争取进步”的“结果是怎样呢？在哥伦比亚，贫困状况日益加深；在危地马拉，伊迪戈拉斯依靠着执行火与剑的政策仍然把持着政权；在反对党取得了选举胜利的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在委内瑞拉，正在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措施，结果货币贬值了，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四十，经济危机不断加剧，上百万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生活费用上涨、经济危机加剧……这些就是拉丁美洲人民把所谓“争取进步联盟”斥之为“争取落后联盟”的有力的根据。

为什么这些国家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而它们的境况却越来越糟？墨西哥《费加罗》周刊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争取进步联盟’的款项将带着巨额利息回到美国垄断企业股东的腰包里。”这家周刊揭露，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华盛顿在拉丁美洲发放了六亿零三百万美元贷款，而拉丁美洲各国根据“债务账目”向华盛顿交纳了三亿五千多万美元，以“利息”名义交纳了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美国实际支付的所谓“援助”只有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官方统计材料，这两年华尔街的垄断集团从拉丁美洲共搜刮了十六亿美元利润，就是除去所谓“援助”的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实际上还攫取了十四亿八千九百万美元。据美国《工人周报》揭露，就是在这位自称为拉丁美洲人民摆脱饥饿贫困的施主的肯尼迪当政的一年中，美国垄断企业从拉丁美洲榨取的利润便高达八亿二千万美元，比他上台



前的一九六〇年几乎增多了一亿美元。这就是肯尼迪大叫大嚷“援助”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经济”的真相。

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曾经在洪都拉斯发表过一份所谓“宣言”，它这样说：“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控制这个国家和它的财富，以便得到我们在战略利益上所必需的一切土地。我们必须获得固定的合同，以便保证即使在很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人能和我們竞争。同时，任何其他企业的建立与发展都必须受到我们的控制。我们必须获得让步、特权、免税，我们必须废除关税以及其他一切可以减少我们的利润的负担。我们必须教育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使他們认识到我們的重要性，而且普遍地认识到我們的权威。……我们必须使这个国家日益上升的经济陷于停顿，以便增加它的困难，便利于我們计划的实现。”今天的肯尼迪，比联合果品公司的大老板們更善于掩藏他的狐狸尾巴，在他的言論中，的确很难找到像“控制这个国家和它的财富”、“使这个国家的经济陷于停顿”一类的語言，而是滿紙什么“首先承认，我們北美并不是始终认识这个（半球的革命的）共同使命的重要意义”啦，“帮助加速经济、教育和社会进步”啦，使“命运大部分掌握在各国自己的手中”啦，等等。不过，在这些娓娓动听的谎言掩盖之下，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却是更深刻地摧残着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经济。尽管肯尼迪不断卖弄他的三寸巧舌，从现代辞典中搜尽了所有进步的語汇，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革命者”，可是，他却无法掩盖住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拉丁美洲人民无止境地进行

压榨的恶行。

肯尼迪创造出这么一套“和平革命”的魔术，同时也是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垄断集团的焦灼不安。肯尼迪原以为端出“争取进步联盟”，装出一副慈悲相，就可以彻底消除拉丁美洲的革命“骚乱”。谁知“争取进步联盟”推行头一年，情况就很不妙，“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此，肯尼迪惶恐万状地哀叹道：“历史已经使（拉丁美洲）各国不再有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安全界线。现在再也没有一段悠閑的間隔時間了”；“誰使得和平革命成为不可能，就是使得暴力革命成为不可避免”。早在一九五三年，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就曾經說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在南美的，在拉丁美洲的情况，有点类似三十年代的中国情况，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已在开始。……可是我們并没有对之采取任何适当的行动。事情不断发展下去，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发展到最高峰。好啦，假如我們还是不加警惕，某天早晨，我們睁开眼睛就从报纸上看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发生了的同样事情，在南美也发生了。”多少年来，美国統治集团不但提高了“警惕”，而且采取了它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来阻止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历史并没有按照它的愿望发展。肯尼迪如今梦想借助“和平革命”的招牌，对拉丁美洲继续进行殖民統治，結果只能是枉費心机。《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說得好：“在美国垄断控制越厉害、寡头势力的剝削越殘忍、工农群众的处境越不能忍受的那些国家里，……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人民的革命。”事情正是在这样发展着。



肯尼迪正在南越重蹈历史的复轍

陈 有 为

“现在是应该把关于印度支那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告诉给美国人民的时候了……。我直言不讳地认为，不管美国在印度支那投下多少军事援助，都不能征服一个到处是而又到处都不是的敌人，一个受到人民的同情和暗中庇护支持的‘人民的敌人’……。”

这段话，是一个美国人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对美国参议院说的。

这个美国人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民主党参议员，今天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在肯尼迪讲这段话的时候，奠边府战役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半岛正面临着彻底崩溃的末日。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阻挡越南人民的胜利攻势，以便把印度支那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叫嚷着要冒“严重风险”，纠集西方盟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派出载有原子武器的美国军舰“拳师号”和“菲律宾号”到南中国海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肯尼迪当时不满艾森豪威尔政府向美国公众隐瞒干涉印度支那的真相，并且反对进行这种“徒劳的、自找毁灭的”冒险；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把军队派到（这个）世界上地势最艰险的地方去”，“将会碰到一种远比……在朝鲜碰到的情况甚至更为困难的情况”，而“看不到一线

胜利的希望”。

但是，八年后的今天，当了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却面对着他过去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同样的责难了。

美国的一批教授和科学家们，今年四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致美国总统的一封公开信，责问肯尼迪“为什么把（美国的）陆海空军派到南越去导致死亡和流血”。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肯定一直在参加南越的战斗；美国的伤亡人数在增加，……美国已卷入了一次真正的，虽然没有宣布的战争”，但是肯尼迪“本人对这种危险的局势只透露了微不足道的一点情报”，因而使得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都没有适当的机会来公开说明和辩论”美国政府在南越的政策。这封信特别向肯尼迪指出：“你在一九五四年当参议员时所说的这些话，都适用于你的政府一九六二年在南越做的事情。”

肯尼迪为什么这样前后矛盾，从当年的不愿冒险变为现在的不惜冒险呢？其根本原因是：美帝国主义今天在印度支那半岛已经取代了法国殖民者的地位，它把对越南南方和对老挝的武装干涉看做是它在全世界加紧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南越人民和老挝人民爱国斗争的蓬勃



发展和节节胜利，不但打破了美国霸占印度支那半岛的美梦，而且危及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整个殖民统治结构和侵略部署。肯尼迪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力图保持住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残局，正是他登台后一再表示“必须投入全部精力”以阻挡整个亚洲和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总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他不但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部侵略政策，而且比他的前任干得更狡猾、更冒险。

现在，美国在南越的军事人员，已经从印度支那战争停火时的二百人增加到六千人，他们不但充当“顾问”，而且直接指挥和参与作战。美国给吴庭艳傀儡集团的“援助”每年高达四亿美元之巨。美国的高级军政官员，从副总统、总统的军事特别顾问、国防部长、助理国务卿，到驻太平洋武装部队总司令和陆军司令等等，接二连三地到南越“访问”、“视察”。美国用来进行干涉和镇压的工具，不但有飞机大炮、震荡炸弹，而且有脚镣手铐、军用猎犬和化学药剂。美国干涉和控制南越的计划，从“八点措施”、“斯特利计划”到“日出行动”，一个一个地拟订了出来。总之，肯尼迪政府所策划的一整套关于“特种战争”的办法都正在南越付诸实施。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当年在印度支那半岛还只走到“战争边缘”的话，今天的肯尼迪政府却已在南越进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了。

但是，肯尼迪政府在南越的这一切侵略行动，都是“悄悄地”进行的。五月四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美国在南越“这种

影响深远的义务是在极少引起公众的大惊小怪的情况下，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词承担下来的。美国在南越的活动一直在不声不响但却是大规模地增加着”。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首脑们，对于美国干涉南越的规模与性质，始终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敢直言。他们说什么美国只承担“训练”与“后勤支援”的“义务”，充其量也只承认美军在“陪同”南越伪军“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被迫地”处于“战斗状况中”而已。肯尼迪本人在今年二月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一再向他提出关于美国在南越“牵连得多深”和“是否已尽可能多地把一些事情告诉了美国人民”的问题时，肯尼迪显得很不耐烦，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他只能“试图……尽可能地使人们知道一切情况”，作到“尽可能地坦率”。总统既然封了口，知趣的记者也就只好转移话题了。

八年前曾经激烈指责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的真相说得不夠“坦率”的肯尼迪，现在为什么自己也对美国在南越的行动諱莫如深呢？这当然是有他的难言之隐的。

肯尼迪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知道，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美国在南越的行动是为了“维护独立”、“保卫自由”、“促进社会进步”，但是美国人民却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必须派兵到南越去“支持吴庭艳的腐化和反动独裁政权”，在那里“导致死亡和流血”。肯尼迪承认这在美国国内是“一个非常容易激感情的问题”。他害怕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会束缚住他对南越进行武装干涉的手脚，



因而竭力掩飾南越局势的一切真相。

但是，肯尼迪政府这种“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干”的所謂“新方式”，难道能掩盖美国人民的耳目以及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实质嗎？难道能挽救美国在南越的失败嗎？事实是，它即使投入比八年以前多得多的赌注，但是前景却仍然像八年以前一样的遥远和渺茫。合众国际社前驻西貢分社社长多門，今年四月底在重訪旧地以后发出的几篇連續报道中承认：“对在南越的大多数美国人來說，战争只是刚刚开始”；那里的“美国顧問們现在承认，用在乡下进行大规模的、吃力的扫蕩的办法，是永远不能获得胜利的”，因为每次“扫蕩”之后，军队的坦克和卡車一开走，南越人民自卫武装力量立刻又出现了。这个記者发现，在南越，支持南越人民自卫武装的“力量分散在……数以千計的农村里”，南越人民自卫武装的人員，“同农民群众一道亲密地学习和劳动，并且使自己同农民們完全打成一片”。这个美国記者所得到的結論，正是同八年以前肯尼迪得到的結論一样：在南越，“遍地都是敌人而同时又哪里都沒有敌人”。

对于美国侵略者和他們的走狗吳庭艳集团來說，南越人民的爱国自卫斗争就像是一个无边无际而又深不可测的海洋。《紐約时报》說，美国和南越伪軍虽然学会了“游击战术”，却没有“学会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的确，他們永远也不可能学会这种“游泳术”，当然也永远不可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他們即使暂时还是那样凶恶殘暴和拼命进行掙扎，但也免不了要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洋中

下沉而灭頂。

不是嗎？在肯尼迪政府对南越进行猖狂的武装干涉一年多以后，南越人民的爱国自卫斗争不但沒有熄滅、削弱，反而更加猛烈，更加扩大了。现在，美国官員和报刊評論員們不能不承认，“南越的軍事形势是难以控制的”，美国正在进行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一个“长期、緩慢、艰巨”的过程，“在这个长期战斗中不会有重大的胜利或解决的办法”，“美国用純粹的軍事手段不可能取得胜利，就是用社会改革也不可能”。

当然，肯尼迪政府现在还没有放棄自己的迷梦。肯尼迪本人在今年四月間举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仍然表示，美国“在南越不能罢休”。据美国报刊透露，美国的軍政决策人員正在謀划着提高南越战争的“級別”，扩大战争的規模，而且一直在鼓吹“南越問題不可能孤立地解决”，主張把美国在南越、老撾、泰国的軍事行动联成一片，准备在印度支那半島的这个地区打一次朝鮮式的战争。

肯尼迪政府这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侵略行徑說明，南越人民今天面临着比过去更加凶恶的敌人，他們爭取独立解放的爱国正义斗争还有着艰巨和曲折的历程。但是，法国老殖民者所失敗了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者能够成功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做不到的，肯尼迪政府能够得逞嗎？在朝鮮半島上潰敗了的，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能够取胜嗎？历史已經懲罰了过去侵略印度支那半島的帝国主义者，它也必然会对美帝国主义者作出同样的判決。



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的发展

· 許 滌 新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要求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和各部門內部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按比例地分配生产資料和劳动力，要求国民經济各部門的发展必須服从国家的統一計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客观上也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資料为資本家所占有，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比例关系只能通过周期性經济危机去強制地实现。列宁說：“资本主义必須經過危机来建立經常被破坏的平衡”^①。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人們就能够自觉地通过国家的計劃，正确地安排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的比例。恩格斯說：“无产階級夺取社会权力，并用这个权力把从資产階級手里取来的社会生产資料变为整个社会的財產。这么一来，无产階級就使生产資料解脫了

一向为它所固有的作为資本的那种性质，而使它們的社会性能有完全的发展自由。从此，按照預定計劃来进行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了。”^②

国民經济发展中最重要比例关系，是生产資料的生产和消費資料的生产之間的比例关系。消費資料主要是由农业和輕工业部門生产的，生产資料主要是由重工业部門生产的。因此，消費資料的生产和生产資料的生产之間的比例关系，一般是通过农业、輕工业和重工业之間的比例关系反映出来的。农业和工业之間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經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农业是发展国民經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必須依靠农业的发展。就是說，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农业的制約，工业发展的規模和速度，不能超越农业提供商品粮、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目前我国农业还未脫离以人力操作为主、畜力耕作为主和使用自然肥料为主的情况，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业对于工业发展規模和速度的制約，就更为显著。当然，农业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工业的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水利建設的设备、电力建設的设备、运输工具、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都是要从工业方面取得的。农业如果离开工业，就不能实现技术改造，就不能实现农业現代化，因而，也就不能充分地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这里。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

① 《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頁。

②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0頁。



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正确地反映了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

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轻工业的发展不能离开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为轻工业制造设备和提供一部分原料、材料，如果没有这些，轻工业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同时，重工业的发展也不能离开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和提供消费资料，如果离开轻工业的支援，重工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要求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冶炼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以钢铁工业为例，发展钢铁生产，不但要增加钢铁的冶炼能力，而且要相应地增加采矿能力、选矿能力和轧钢能力。如果采矿和选矿能力小于冶炼能力，那末，冶炼能力就难于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轧钢能力小于冶炼能力，炼出来的一部分钢锭就不能及时轧成钢材，供应加工工业的需要。在发展钢铁工业时，还要相应地发展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等部门。这些部门，如果没有按比例地相应地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此外，上述这些部门，在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时，还需要农业和轻工业部门供应消费资料。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它只能在同有关部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才能顺利地发展。如果把某一部門过分突出而不照顾到左邻右

舍，如果这个重点部门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占得太多，就会削弱其他有关部门的生产，而那些受到削弱的有关部门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个重点部门的生产。

基本建设和生产，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基本建设搞得太少，从长远来看，生产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基本建设搞得太多，就会削弱当年的生产，就会分散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物资供应呈现紧张，而投入生产的项目反而不多。基本建设工程有很多是不能在当年投入生产的，规模越大的基本建设单位，从开始建设到投入生产的过程就越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材料和设备，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在基本建设方面支出的工资，很快转入市场购买生活资料。特别是农民变成工人之后，他们的购买力会迅速上升。这样，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而且由于职工人数的增加，增加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基本建设的规模过大，就会影响到劳动力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会影响到日用品的供应和居民的货币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我们在处理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重工业能够提供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能力，而且要考虑农业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和劳动力；不仅要考虑到生产上长远的要求和建设上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当前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这个规律，就有可能正确地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计划生产。



但是，可能性并不是现实。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认识这个规律，学会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只有这样，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才能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

二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计划工作，自觉地安排平衡，但是，不平衡的现象仍然会不断出现。毛泽东同志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①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平衡的原因很多。例如：（一）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技术革新，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破旧的平衡。例如，由于技术革新，冶炼一吨铁所需要的焦炭平均消耗量，比过去减少了，那末，钢铁部门对于焦炭的总需要量就会减少，从而，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不能不发生变化。（二）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也会在生产上引起新的不平衡。每逢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出现以后，它为有关部门提供产品，就会推动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同时，也要求很多部门为它服务，要求得到必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这样，原来的平衡和统一就被打破了。我国建立汽车工业、农业机械工业和其他新工业部门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三）工业的发展是受到农业的制约的。在现在的条件下，农业生

产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情况。风调雨顺的时候，用同等数量的劳动，能够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去发展工业。在农业生产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产量减少，就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进行。农业丰收或歉收，都会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化。（四）某一部门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就引起这个部门同其他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例如，当个体手工业改造成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上述情况说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经常冲破旧的平衡，出现新的不平衡。但是，也有一些不平衡，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人们在主观安排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当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候，经济计划就会违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就会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出现不协调的现象。毛泽东同志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②客观规律是能够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但是，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可能要犯一些错误。有一些问题，由于人们缺乏经验，没有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发生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也有一些问题，只要我们认真走群众路线

^{①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2—13页。



織，加強調查研究，善于同專家、技術人員、工人和農民商量，是可以避免發生錯誤的。因此，我們應當經常總結經驗，不斷提高認識，克服片面的、主觀的觀點，使我們的經濟計劃工作更加符合于客觀實際。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平衡，同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的一種反映，是對抗性的矛盾。資本主義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只有通過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出現的不平衡，並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不平衡，能夠通過國家的自覺調節而轉化為新的平衡，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這是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的客觀過程。認識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是為了正確地解決矛盾，使其達到相對的平衡。列寧說：“經常的、自覺地保持的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①。根據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經常進行綜合平衡工作，使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保持相對的平衡，正是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工作的任務。

正確地處理薄弱環節同先進環節之間的關係，是綜合平衡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從發展上來看，應當改進薄弱環節使其適應於先進環節的要求，以解決它們之間存在的

平衡。但是，改進薄弱環節，需要有一定的條件，需要有一個過程，要我們去做一系列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勉強使薄弱環節去適應先進環節的要求，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種積極的方法，事實上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方法。因為採取這種方法並不能消除薄弱環節，反而會擴大薄弱環節同先進環節之間的不平衡。正確地處理薄弱環節同先進環節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一系列的艱苦細致的工作，逐步地去改進薄弱環節；另一方面，在薄弱環節沒有得到改進以前，需要適當地放慢先進環節的發展速度，這樣做並不是消極的平衡方法，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改進薄弱環節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就難於得到保證。在一定的時候適當地放慢先進環節的發展速度，不但可以保證薄弱環節的改進，有利於切實地解決薄弱環節同先進環節之間的矛盾，而且有利於先進環節本身的充實、鞏固和提高。

在進行綜合平衡的時候，必須從國民經濟各部門、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出發，既要看到需要，又要看到可能。從實際出發，就是不但要根據當時工業已經達到的設備能力，而且要根據當時的糧食、燃料和其他重要原料、材料的供應能力，安排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指標、基本建設指標和它們之間的比例關係。糧食、燃料和其他重要原料、材料，是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進行綜合平衡的物質基礎，對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進行綜合平衡，是不應當超越當時物資供應的可能性，而單憑人們的主觀需要去安排的。如果

^① 《非批判的批判》，《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頁。



离开客观的可能性而片面强调需要，就不可能达到平衡。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必须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这就是要把一切应当办和可能办的事情，纳入国家计划，并且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要考虑到各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国家的综合平衡同各部门的专业平衡和各地方的地区平衡，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综合平衡是以专业平衡和地区平衡为基础的；专业平衡和地区平衡，必须以综合平衡为前提。各部门、各地区，如果不遵守国家的统一计划，各自为政地去安排平衡，必然会分散力量，使应当快办的事情推迟，使应当推迟的事情反而提前，这样，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没有统一性，也就没有计划性。分散主义同综合平衡是不相容的，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所提倡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的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减少可能的资源资金的浪费和产品的积压，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必须认真地加强协作和平衡的工作，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①反对分散主义，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是加强计划性，做好综合平衡工作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分别主次、先后、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先办那些应当办、可能办的事情，推迟那些应当缓办、可以缓办的事情，才能收到经济上应有的效果。在这里，部门之间、地区之

间、部门和地区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在某些方面是会存在着矛盾的。当综合平衡同某些专业平衡或地区平衡发生矛盾的时候，综合平衡在可能条件下要照顾专业平衡或地区平衡；但是，更重要的是专业平衡或地区平衡必须服从综合平衡，局部必须服从整体。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对于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必须保留一部分作为必要的后备和储备，而不应当“满打满算”，把全部的积累都用到生产或基本建设上去。留有必要的后备，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能够灵活地调度各种物资，能够从容地应付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和其他意外事件，能够及时地调整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衡，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不断扩大。

三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合理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正确处理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反映着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现代工业主要是由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经营，农业主要是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好，农业能够得到必要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有可能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



以大量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去支援工业，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得到顺利发展。这样，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更加密切，它们的发展就更加迅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就更加巩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不好，农业得不到必要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削弱，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就不能顺利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不利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利于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壮大，也不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可见，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重要问题。

(二)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要正确处理现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现代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安排劳动力和分配生产资料时，必须适当地照顾手工业企业。这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才能为社会提供丰富多采的手工业产品，也才能保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收入。

(三) 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反映着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能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同时，又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但是，积累和消费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果积累的比重占得过多，就会使人民的眼前利益，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受到影响；反之，如果积累的比重占得过少，就会使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受到影响，从而，就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受到影响。因此，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①

(四) 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国内市场的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矛盾，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的矛盾，即是说，生产方面和分配方面的问题，都会集中地反映在国内市场问题上。国内市场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必须把生产过程同流通过程统一起来考虑，必须把社会生产同人民生活统一起来考虑，必须把国内市场的問題，放在安排生产的视綫之内。在安排市场問題的时候，必须注意居民日益增加的购买力同日用消费品可供量之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才能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提供有利的条件，才能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教学小品

敢 峰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

教师不但要教好课，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

我国有句古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生不能跟教师一辈子，教师也不能教学生一辈子。对于学生攀登知识的千山万壑，教师毕竟只能作一些指引和教给他们一些攀登知识山峰的基本的本领，将来能否有所成就，还要靠学生本人的努力。路，终究是要自己去走的，在学习的道路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学生幼时要教师领着走，跟在教师后面走，都是必要的，但总还要慢慢地学会自己独立地走。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这是教学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学生终生做学问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学生有了自修的能力，是在学习的道路上终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过去不少有学问的人，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没有受过系统的完备的教育，没有上过大学，甚至也没有上过中学，他们的学问主要是靠自修得来的。如果说他们上过大学也可以，那就是社会大学、生活大学、自修大学。他们在刻苦自修中碰到了问题，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摸索、探讨，

还千方百计地寻师访友，求得指教。他们走的路虽然是曲折的、艰难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中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以能够扎扎实实地获得知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为我们的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应当教育学生珍惜这种学习条件，引导他们更加发愤和刻苦地学习，培养自修能力。千万不要使学生错误地认为，现在学习条件好了，学习就成了轻而易举、不费苦功夫的容易事情，就可以躺在教师身上，一切依赖教师了。目前在教学上，有的教师终日只忙于给学生装知识，却忽视了在此同时要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因此，有些学生也只希望教师把知识嚼得稀烂来喂自己，而不懂得或不注意锻炼自己的自修能力；碰到一个新问题，自己还没有去钻研就叫难不迭，要求教师给现成的答案。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计算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这是普通教育阶段教学的重要任务。要指导学生在学基本知识和进行基本训练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学会正确的自学方法，锻炼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逐步做到离开教师也能



够走路。这样做，当然并不是說不需要教师的指导，更不是把教师在課堂上应当解决的問題推給学生去自修，加重学生的学习負担和困难。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最重要的是通过教学实践为学生打好自修的基础。首先是逐渐培养学生正确的立場、观点和学习方法，以及严格认真的学习态度。这是学生自修能力的灵魂。其次，要帮助学生认真掌握一定的文字工具(如文言文、外文)，学会运用一般的工具书(如字典、辞源等)。牢固地掌握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技巧，是自修所必须具备的起碼条件。第三，还必须进一步使学生打好文化知識和技能的基础。这个基础打得越好，学生的自修才能进行得越順利，今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盖起更高的知識大厦来。

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主要应当通过学校的教学实践去进行。諸如：在讲课前帮助学生功课进行适当和必要的預习；在課堂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活跃学生的思想，在系統讲授的前提下，适当地让学生回答一些問題；要督促学生独立地完成作业，根据不同学生在作业中碰到的实际困难，加以指点；在理化实验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的能力；等等。此外，还要提倡学生适当地多讀一些好的課外书籍，向他們介紹各种好的讀書方法，最好还能使他們养成写讀書筆記、积累資料和做索引等良好习惯。

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这是教学上

的“金不换”，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教师在教学上不但要打开知識的大門，引导学生走进去，还应当把打开知識大門的钥匙交給学生，让学生掌握。

“死”而后活，“死”中有活

先讲一个寓言：

古代两个哲学家站在一只肥猪面前，研究如何能将肥猪肉变成自己的肉。

哲学家甲主張把猪杀掉，吃下肚去。

哲学家乙反对：“不能吃死猪，死猪怎么能变成活肉呢？”于是走到猪面前，用手摸摸，用鼻子聞聞，以为这是将猪肉变成自己的肉的最好方法。

讀書，就是要使书上的知識，使前人的斗争經驗，成为自己知識上的血肉。有些人怕讀“死书”，結果就少讀書或不认真讀書，只是“用手摸摸，用鼻子聞聞”，並沒有把书上的知識細細咀嚼吃下肚去。

談到讀“死书”，我就联想到一个讀書方法的問題：“死”而后活。这里說的讀“死书”，不是像书呆子那样以死讀死記为最終目的，而是认真地讀，老老实实地讀。“死”而后活，就是使书上的知識，經過自己的理解、記憶和独立思考，变成自己活的知識的血肉，并在实践中能正确地运用它，这样，就把书讀活了。同时，在讀書的时候，要边讀边想，尽可能地把书上的知識同自己生活中的现实問題，同自己要解决的問題联系起来，做到理論联系实际。这样就可以从“死”中求活。好



比我们吃东西，虽然吃的都是死的做熟了的东西，但经过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就能成为我们身体的活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怕读“死书”而不认真读书，不从“死”中求活，结果从书上什么也得不到。

读书的最大毛病是不“死”不活。不“死”，就是不老老实实地读书，坐不下来，读不进去，浮光掠影，一知半解；不专心，不踏实，怕困难，想偷“巧”。这是读书上的一条大忌。不活，就是不了解书中的精神实质，不能联系实际，不会运用。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死”而后活，“死”中有活。首先要坐下来老老实实、专心致志地读书，真正要有“十年寒窗”的那种苦学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一丝不苟，也就是说一定要先“死”。读书如何由“死”到活？这就要在老老实实读书的基础上，努力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分析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读书中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读书从“死”到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下苦功夫读书到深入掌握书的精神实质的过程，从深刻地理解书中的内容到实际运用的过程，从更高的要求来说，还包括从学习到独创的过程。古来也有一些人读书读“死”了，读成书呆子，这主要是囫圇吞枣，食而不化，不会运用。只要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就可以避免这一点。古语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读书没有入“虎穴”的苦学精神，怎能把手中的知识和精华学到手呢？但是，入“虎穴”是为了得“虎子”，不是要让老虎吃掉。读书是为了学到有

用的东西，不是为变成书呆子。因此，读书要从“死”中求活，先“死”后活。不求活，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要使学生的才能 有充分发展的天地

学好课堂教授的各种知识，是对全班学生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对一些程度较高、在某一方面有才能的学生来说，只是课堂教学还不能满足他们在学习上的进一步要求。因此，对这些学生，除了严格要求他们完成课堂上教师规定的功课外，还应当组织他们在课外多读一些书，和参加一些有利于发展他们才能的课外活动，使他们的才能有充分发展的天地。

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普遍提高全班学生各科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程度，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总会有几个“拔尖”的学生，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使他们在切实学好各科知识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不但是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同时对带动全班学生的学习和钻研风气，也有很大好处。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是牺牲多数学生的学习来培养少数几个人，不是满园春色中的“红杏”，而是满园荒蕪中的“红杏”。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我们要在全班学生学习质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使几枝“红杏出墙”，从而使满园的春色更加鲜艳美丽。

在科学文化的领域中，一个人在某一方



面的才能的成熟，一般說来是較晚的，需要經過較长时期打基础和勤奋学习、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才能和天才的萌芽往往在青少年的学习阶段就开始显露了。教师除了努力提高全班学生的学习程度外，还应当注意发现在本門課程中有才能、有天才萌芽的学生，精心加以培养。十个指头有长短，要求学生的程度一刀齐，或者門門功課都要五分，把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都安排得死死的，沒有多少自由支配的余地，这是教学上的一种有害的平均主义倾向，是不符合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

教师要善于海闊教魚跃，学生要善于天空学鳥飞。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因而充分发展学生的才能，关键仍然在于严格訓練他們和正确引导他們，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因材施教地培养他們，为他們今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打下更好的根基。否則，学生的才能或天才往往因根基淺薄而曇花一現，結不出丰硕的果实来。历史上这类的經驗教訓很多，我們应当特別記取。教师在課堂上要狠狠抓紧各科基础知識和基本訓練的教学，在課外，除了

要巩固課堂上的教学外，对那些程度特別好的学生，或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有天才的学生，还要加以个别的指导和帮助，使他們在学习的道路上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能跑多远就跑多远，既不要放任自流，也不要加以限制，以一个框框去套死。在学习上要保证他們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時間，給他們創造一定的学习条件，并加强对他們課余学习的指导。同时，学校还可以适当地（不是过分地）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办墙报、优秀作文展覽、数学比赛、写字比赛、朗讀和演讲比赛，以及举办課外閱讀小組、課外科学技术活动、課外文学艺术活动、課外体育活动等等，来满足学生課余的各种正当的爱好和要求，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在各种課外活动中得到鍛炼和提高。在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要注意：一、必須以教学为主，要有助于課堂教学而不是削弱課堂教学，更不是代替課堂教学；二、必須完全采取自願的原则；三、不要过多地牵扯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要注意劳逸結合。这些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学生就会从中得到很大益处，天长日久，就会培养出人才来的。

